



回眸中国文学史,离不开汪曾祺。研究新时期先锋文学,研讨汪曾祺,绕不过小说《受戒》。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是由《受戒》这块核心底座参与奠定的。汪曾祺在《受戒》的末尾特地注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眨眼之间,恍如梦境,《受戒》发表已经43年了。研究和评论《受戒》的文字,更是与日俱增,常评常新。评论家马风从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的比较中,从文学史角度论证:“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李锐从形式变革的角度指出:“新时期小说文体变革是从《受戒》开始的。”格非则从小说观念和文学传统的角度认定:“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这三位的评价和论述是中肯的。《受戒》确实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树立了多维度标杆,在同类作品中,至今难以超越。

43年来,人们对《受戒》的艺术性、创新性形成共识,但对其反映、折射的现实性、政治性认识不够,有人甚至激言:《受戒》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是“去政治化”的桃花源。其实不然,极具艺术力地表现了政治,艺术之美和政治之美并蒂莲开,也是《受戒》的先锋和创新之一。

一、咬“戒”之饵,拖钩者入潮,于无形中表现思想解放、破除清规戒律的时代政治

汪曾祺在与台湾作家施淑青的对话中言明:“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人是不能受压抑的”“人性的解放”,这是我们解读《受戒》的密钥。在谈到以小英子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心理比较健康、摆脱礼教束缚时,汪曾祺挑明:“这是思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害。”建国后的历次所谓政治运动,对人压抑最大的是极左紧箍咒般束缚的“清规戒律”。通读《受戒》,我们不难体会,“受戒”是引子、是障眼,骨子里都是蔑戒、逆戒、犯戒和破戒。

当和尚,是要受戒、持戒、守戒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小说一边说庵里没有清规戒律,一边又表现善因寺里还有清规。小英子则不受清规戒律的压抑,她兴奋地来到善因寺,看望受戒中的明子。迎门矗着两块大牌,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大字:“放戒”,一块是:“禁止喧哗”。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连吃粥都不能出声,否则也成了变相的“喧哗”。大和尚手握戒尺严禁,谁吃粥吃出声,谁就要吃戒尺。“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声!”其禁忌真比一言堂还厉害!小英子见到明子坐在里面,“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还是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

新时期扛鼎之作依然熠熠生辉

——对汪曾祺《受戒》先锋政治的考量

□ 陆忠场

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她视寺庙为自家的庭院,把清规戒律踩在脚下。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英子,几乎成了蔑戒、逆戒的圣女。庵里犯戒,破戒的言行随处可见。老和尚过年也吃肉。大师父收钱记账。其他师父呢,不务正业,各有所好,各尽其兴。小和尚明子常离开庵里,去帮助干活,和小英子暗生情愫,明子和小英子在芦花荡结合了,受戒之日就是破戒之时。

二、逆“流”而上,有机融合,携永恒生命和爱情的美学清新归来

在极左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政治挂帅、艺术次之成为主流,爱情、人性、自由等成为禁区。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受戒》里的爱情和婚姻,突破了革命加爱情模式,自然“出格”。《受戒》的爱情和婚姻是被边缘化的“伊甸园”,边缘化的地域——城郊的农村,边缘化的环境——庵、庙和小庄子,边缘化的人群——和尚、农人。边缘的边缘不愿被清规戒律所束缚,更何况其他地域、其他环境、其他阶层人呢。

《受戒》写小英子和小和尚明子的爱情颇具特色:一是小英子总是占具主导地位。在小英子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的出击下,明子于真爱中被牵着走,走着走着,就相互依偎了。二是明里暗里有戏谑的味道。菩提庵被讹叫荸荠庵,荸荠庵里有“荸荠”,小英子有意将明子的脚趾当作荸荠踩;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那颗明澈的心乱了。乱了和尚,彰了人性,还了本真。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汪曾祺很精细,把两人爱情发展逻辑理得合情合理。两人初识,小英子主动搭腔,以后一直叫明子,叫小名才显无间。明子拿着打兔子兼偷鸡人的铜蜻蜓和小英子一起玩,两人用小英子家里的鸡做试验,玩到、试到这个份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子帮小英子家干起薅草、打场、夜晚看场、车水、汪牛、踩荸荠等农活。特别是认了干娘,两人夜晚并肩坐在石碾子上看场,从而发展到在踩荸荠时,小英子总是故意踩明子的脚,两人就“踩”到一起了,这就为划船划到芦花荡里野合奠定了感情基础。四是清纯、干净而富有诗意。小说中富有诗意的细节描写耐人寻味,真实而空灵,自然而深情。在写小英子、明子的交往中,“花开”三度,就很有诗意和韵味。首先,小英子家“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

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顶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栀子花香飘庵里,似乎暗合一枝红杏出墙来。其次,明子给大英子画绣花样子,就是小英子请来的,就是小英子掐下实物,让他照着画的石榴花、栀子花——画得真,画得鲜,画得跟活的一样——爱情之花也鲜活在两人的心上。再次,小英子到善因寺接明子回来(途中划船须经芦花荡),小英子的打扮也离不开花:“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两朵花又出现了,花为心上人而插,他俩的爱情成熟了,想“压抑”也“压抑”不了。

三、寻根溯源,有心插柳,汪曾祺表现文学政治的勇气和艺术来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手擎《受戒》的为什么是汪曾祺?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偶然,实际上具有俊才逢盛世、出手成经典的必然性。

一是诚心诚意地向社会向生活学习。汪曾祺向古今中外学习,向各阶层群众学习,向现实生活学习,不断端正自己的文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受过伤的心总是有韧的”,汪曾祺用新时期的精神、创作和工作实绩,实现自我弥补、自我修复。就连回高邮探家,他也不放弃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他实地采访修鞋匠高天威,以其为原型,完成了反映文革派性作怪、干部作风腐败的小说《皮凤三榷房子》。善于学习、思索和实践的汪曾祺,有着过去生活的阅历,拥有丰富的创作才能,又喜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犹如春天的种子,生根、开花,结出《受戒》的果实是必然的。

二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清醒与自觉。早在1947年,汪曾祺就撰写《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其中关于小说的定义、模样、结构、语言、诗意、留白、情感、责任、叙事方法,以及小说的开放性、现代性、包容性等,现在读来还是十分亲切,依然是旗帜式、纲领式的文献。在谈到《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的创作体会时,汪曾祺说:“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

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汪曾祺还说:“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汪曾祺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付诸创作实践的。

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不能违背世道人心,不能让人厌腻和反感。汪曾祺对政治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他的作品包括《受戒》,精确地表现了文明政治的美,让政治艺术地抵达人心,让文学之美和政治之美水乳交融。汪曾祺说:“我想主题不要外露,包藏的越严越好,思想溶化在形象里。”在《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中,汪曾祺是对政治倾向作了“淡化”和“隐蔽”处理,这种处理不是“淡”得无边、“化”得全无、“隐”没踪影,而是润物细无声。人们可以借鉴和吸取《受戒》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成果,但不能唯此独尊,不可以也没必要群起仿而效之、唯此推而广之。

三是始终追求“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境界、责任和效果。历经寒冬的汪曾祺,倍觉世间温暖的宝贵。温暖是多元的,人们需要经济、政治、社会、自由、人性等多种温暖。《受戒》里充满了温馨的烟火气,庵里除了念经、放焰口、打牌之外,也有几个账本,经营生财之道。小英子的父亲是个能干人,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磨、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等;小英子的母亲是个聚宝盆,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春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筐,剪花样子等。在帮工的日子里,是要改善伙食的,打场的号子响彻多场。庵中、庙里存欢乐,庄上、荡里有欢愉。人们挣扎着、劳动着,为的是生活能有余一点,后人活得好一点,未来更温暖一点,朝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小英子家的门联)的小康之家更近一点。民众福祉,百姓甘苦,人间温暖,始终萦绕在汪曾祺的心头、笔端。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虽然没有突出政治,但不等于没有绵里藏针的思想、锥处囊中的政治。《受戒》的文眼是“戒”,看起来是守戒的,而实为破戒。小说表现破戒用笔最为着力的有两处:一处是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成熟了,水到渠成地划进芦花荡。另一处是和和尚吃猪肉,汪曾祺一步步将吃肉推上了犯戒、破戒的高潮,也是破除清规戒律的高潮。

《受戒》的诞生,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时代之大幸,是文学革命、艺术创新之大幸,也是汪曾祺本人之大幸。“温暖的篝火在燃烧,作家应该往火里投进几束新柴。”《受戒》发表已经43年了,汪曾祺梦到的情景也已过去86年了。《受戒》如春日花树,繁花似锦,令人惊艳。字里行间,初看平平常常、浅显易懂,深思细评难达底蕴、难抵妙谛。一千个人阅读,有一千个《受戒》。人们会一代代阅读下去,《受戒》的余辉余韵余温也将持续下去。

于所长

□ 周立鸣

1975年8月,我作为下放知青,经高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插队落户到高邮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锻炼。

当时县农科所所长是于福珍。于所长五十大几岁,中等身材,略微显胖,穿着朴素,慈眉善目,说话干脆利落,中气十足。在后来的劳动锻炼中,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于所长是一位老革命,当过高邮县委组织部部长。

高邮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五七干校,它位于高邮三荡口——东墩公社、一沟公社、张轩公社的交界处。作为五七干校,这里曾是高邮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等劳动锻炼、学习改造的地方。从五七干校转型为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正式编制人员是几位所行政领导加上六七名农技师,而他们承担着水稻与三麦新品种的选育、大面积种植试验田、上百头猪场的繁育任务。他们和从全县各公社抽调过来的一百多名农民以及我们三十多名下放知青组成了农科所的大家庭。于所长就是这上百亩地、上百人口大家庭的大管家:管吃、管住、管安排、管科研、管生产。

农科所的第一要务就是农业科学研究。于所长把农科所的几位农技师当个宝,结合每位的专业特长,让他们分别担任水稻育种组、三麦育种组、激光育种组、光呼吸育种组、良种猪繁育组等项目负责人。于所长将我们三十七名知青分配到试验组、养猪场、生产排(有点像部队编制)等项目组,让我们充实到各项目组跟班学习,拜师学艺,同时也嘱咐农技师要做好帮带知青工作。于所长常常教导我们:农科所的主责

是抓农业科技,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你们要安心搞生产,要专心学技术,不要虚度年华!

农科所的农业研究项目多、吃饭人口多,而财政补贴却很少,钱根本不够用。面对当时的状况,于所长认为:靠上级财政,县财政本身就困难,难要;靠农业收成,农产品价格本身就低,难富。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所长想办法创办研究所工厂,依靠自己走市场化路子,为农业科技筹措资金,以工养农。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于所长忙碌的身影:他千方百计找路子,弄来了好几台车床,办起了机械加工厂;他千言万语费尽周折争取钢材计划,为生产运转提供保障;他千辛万苦东奔西走,为产品找销路。在于所长的领导下,工厂生产很快就正常化了,赚到了钱,科研经费及农业人员、知青的工资都有了保证,知青在工作岗位上也都学到了过硬的技术。农科所的科研、生产、生活等都生机勃勃,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

于所长平易近人,他和我们同吃大食堂、同住普通房、同劳作在生产车间与试验场。在田头,在车间,在食堂,只要有时间,他就给我们讲党史、讲革命战争史、讲青年成长史,赢得我们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敬重。

近日,友人送我一本书《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高邮县组织史(1927.12—1987.12)》。我看到中共高邮县委委员会(1949.10—1956.4)领导名单中,于福珍曾任高邮县委副书记(1956.5—1957.10)。我又一次被震惊:这样资历的老干部能上能下,从不争名夺利,忠诚干净担当,他就是当下干部的一面镜子;我又一次被感动:这样的老干部在那个年代以工养农,用农业科技赋能“三农”发展,思想如此超前,工作从不推诿,他就是我们身边的焦裕禄。翻看高邮组织史,又一次引起我对于所长的深深怀念。

珍贵的礼物

□ 全竹贵

2022年暑期得知“高邮2022中华全国集邮文献展览”将于10月份在高邮举办(后因疫情推迟到今年3月25日—27日),我决定编组一框整理类邮集《抗日一枝梅 邮坛不老松——怀念高邮人民的老朋友杨勇伟先生》。杨勇伟先生,1921年出生,上海人,2012年去世,享年91岁。他1940年参加革命,在高邮打过日本鬼子,受过伤,立下许多战功,被誉为“抗日一枝梅”。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代表,以后又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集邮联理事,被认定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名誉会士,是首批进入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集邮家,被称为“邮坛不老松”。

在编组邮集的过程中,市藏协书报刊委员会的报友焦成钢老师把我推荐给杨勇伟先生的儿子杨晓伟。焦成钢征得杨晓伟的同意,把他的微信“一枝梅”推介给我,我成为了他的微信好友。杨晓伟老师通过微信,提供了其父杨勇伟先生许多珍贵的资料、图片,为我编组文献邮集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之后,杨晓伟老师还通过顺丰快递,寄来珍贵的礼物,以丰富我的邮展藏品。今年,我的邮集在中华全国集邮文献展览中获得了整理类三等奖,杨晓伟老师功不可没。

珍贵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10枚杨勇伟先生生前与集邮家、集邮名人互相赠送的实寄封,其中张包子俊、赵善长、

白歌乐、陈国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集邮大家。1990年11月26日—29日,中华全国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1月28日邮电部发行了《中华全国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J174M邮票小型张,由我国著名的邮票设计大师刘硕仁设计。杨勇伟先生于邮票发行的当天在北京市牛街邮电招待所从三代会现场挂号寄给“南京石鼓路193号83504部队相小伟”的实寄封,也特别的珍贵。

另一份珍贵的礼物,是杨勇伟先生生前一直珍藏的两本《人民前线》杂志,一本是第17期(1949年11月21日出版),另一本是第32期(1950年3月8日出版)。《人民前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办,从第32期第30页的“为纪念《人民前线》创刊一周年重要启事”中得知,《人民前线》创刊时间为1949年3月20日。第17期的刊头由毛泽东主席称为“马背上的书法家”的舒同题写,第32期的刊头则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

我通过编组邮集,“认识”了杨勇伟先生,又结识了杨晓伟老师。我与杨晓伟老师的结识,算是从“邮缘”到“友缘”。杨勇伟先生和杨晓伟老师都把高邮视作第二故乡,充分表明了他们父子对高邮的无限深情。杨勇伟先生去世前嘱其子女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高邮,与古城高邮融为一体。杨晓伟遵其父亲的遗愿,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捐款30万元给高邮。高邮人民定将永远怀念杨勇伟先生。我也将永远珍藏这两份珍贵的礼物,珍惜与杨晓伟老师的“友缘”。